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
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严昌洪◎著

辛亥革命与 20世纪中国社会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
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严昌洪 著

辛亥革命与 20世纪中国社会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严昌洪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学术文库·文集系列)
ISBN 978-7-216-05817-9

I. 辛…

II. 严…

III. 辛亥革命--文集

IV. K25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082 号

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

严昌洪 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3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字数:349 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5817-9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引 言

书桌上放着3部辛亥革命史论文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下册和《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下册。这3部均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是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961、1981、1991年联合举办的3次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论文的汇编，它们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道路上的3座里程碑。这3次会议都在武汉举行，我有幸出席了后面两次史学界的盛会，也有幸聆听了出席第一次会议的老一辈著名史学家的报告，所以捧读这3部论文集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一、听吴晗等名家作报告

1961年金秋时节，对于刚刚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的新生来说，是兴奋喜悦和躁动不安兼而有之的日子。兴奋的是12年中小学苦读，终于考取了大学；不安的是阴错阳差被分配到历史系学习。在当时“男学工，女学医，文史地，没出息”的社会风气的压力下，有一种“误入歧途”的感觉，有的同学硬是吵着转了系。鉴于这种情况，系里开展了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就在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次接受生动而具体的专业思想教育的机会。

10月16日至21日,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大型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会者超过百人,著名历史学家、中青年学者以及辛亥老人聚集一堂,热烈而深入地讨论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著有《辛亥革命》一书的吴玉章老人主持会议时指出:“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次会议开了每隔10周年举行一次大型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的先例。除197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举行这样的会议外,1981年、1991年分别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8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附记:2001年又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前辈著名历史学家亲临会议,不仅使会议大为增色,也使武汉史学界得到了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各院校历史系竞相邀请知名学者讲学。恐名家难以分身,有关方面通过协调作出统一安排。根据这种安排,附近几所大学的历史系师生集中在富有民族建筑风格,在当时武汉高校中首屈一指的民院礼堂,分别听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吕振羽、翦伯赞、白寿彝等先生的学术报告。部分师生还在小型学术座谈会上听了吴玉章、范文澜等先生的讲话。

记得吴晗先生作报告那天,民院停电,临时将会场改在城建学院(今武汉工业大学校址)礼堂举行。几百师生徒步转移到新会场,秩序井然地聆听吴晗先生介绍他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普及历史知识的情况。他指出,那种认为只有写论文、专著才是学术研究,才是学者专家,而写通俗文章、普及读物是低一等的,不值得去搞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提高和普及必须“两条腿”走路,学术研究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专家、学者能就自己的论文、专著提炼一下,使之通俗化,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则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他的报告给莘莘学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幸的是吴晗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由于惧怕“三家村”的株

连,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们常常不敢对人谈起听过他的报告,虽然那是件十分荣幸而可以引为炫耀的事情。吴晗先生以北京市副市长和史学名家的身份主持通俗读物的编写工作,普及中外历史知识,向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行动和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白寿彝先生是在10月23日对武汉各高校历史系师生作报告的,题目就是《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重点讲了史与论、史与文、精与博三个问题,同时还讲了偏与全、新与旧、教与学的问题。整个报告充满了辩证的观点,对于我们刚刚进入历史系的学生是一种非常及时的专业教育。吕振羽、翦伯赞等先生讲的题目已记不清了,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农民战争等问题。刚跨进校门就能一睹这些史坛名家的风采,聆听到高水平的学术报告,我们大开了眼界,受益匪浅。从这些报告中知道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从而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城中学教书,“文革”期间历史课被取消,我上过政治课(当时称“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语文课,甚至农基课(照本宣科地教学生如何养猪)。但我独钟史学的情愫依然未改,一有机会就向这边“回归”。历史课恢复以后,我以教导处负责人身份“以权谋私”,安排自己带了两个班的历史课。高考恢复了,我立即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终于,在人生的旅途上绕了一个大圈圈后,回到了武汉,回到了大学历史系。

我始终忘不了那些给我启蒙教育的前辈史学家。当年给我们作过报告的吴晗等几位先生先后作古,但他们开创的辛亥革命史学术研究和自由讨论的风气今天已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是可以告慰于诸先贤在天之灵的。

二、“靠‘暗杀’起家”

1981年,正是我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

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之际,迎来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国内学者采取论文评选的方式确定,提交会议讨论的81篇论文是从近200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这81篇论文中有我们的老师章开沅、刘望龄和我们3位师兄的6篇。我与师兄弟饶怀民、赵军在尚未离开校门之际便得以跻身这样重要的学术讨论会,是与章开沅等老师的教育和指导分不开的。

章开沅先生从50年代起便对辛亥革命史研究产生了兴趣。在1961年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被安排在大会首先宣读他的学术论文。他的两篇论文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纵览全局,高屋建瓴,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公认为不可多得的力作。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学者还深情地鼓励他和其他青年学者“不要停留于写论文,要努力写出大著作来”。此后,辛亥革命史成为章先生的主攻方向,自然也就成了他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我们作为章先生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他和陈辉、刘望龄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写出了比较好的论文,因此能入选这次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有点“名不副实”。按照时下一些地方的做法,大凡有一两位外国人点缀其间的会议,就可冠以“国际会议”之名。而这次有来自我国港澳地区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多位学者出席的真正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却没有打出“国际”的旗号。这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分经济、政治、人物评价、会党、文化5个专题组展开讨论。与20年前的那次会议相比,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学术水平有显著提高,并进一步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

湖北武汉地区学者入选论文11篇,在全国各地区中可谓名列前茅。在后来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1981年,长沙)、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广州)、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武昌)等重要学术会议上,湖北武汉地区学者入选的论文数量均保持领先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湖北武汉地区史学工作者的实力,以致广州有位老教授称赞道:

“天下文章一石，八斗出在武汉。”

会上，国内外史学界的老前辈与知名学者固然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尊敬，而我们十几位4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受到会议的关怀和爱护，被人们称为“后起之秀”。其中有云南大学的一位本科生，他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的6位研究生中，年仅28岁的赵军成为记者竞相采访的新闻人物，一篇报道称其为“史坛新秀”。还有两位年轻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位是后来成了我的同事，英年早逝的唐文权先生，一位是后来成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张应超先生，他们坚持业余研究辛亥革命史多年，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论文，会上颇引人注目。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题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章开沅先生在会上所作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国内论文评述》中有这样一段话：“提交会议的其他政治史论文，有些是老问题有新进展，如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会党问题、暗杀问题、同盟会与光复会等等，大多能提出新资料与新见解，分析较之过去更为具体深入。”其中提到的“暗杀问题”，指的就是我的那篇论文。我把它看作是老师对学生作业的肯定与鼓励，从而坚定了我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信心。

这次会议，不论资历、提携后进的做法，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到鼓舞，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后步入史坛、深入史学研究堂奥的重要契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使我得到了比20年前更好的学习机会。中华书局两位资深编辑刘德麟、何双生先生向大会提交了《建国以来辛亥革命史资料出版述略》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用了整整一段篇幅谈了关于搜集、整理、出版社会风俗资料 and 进行社会风俗研究的重要性。我后来以辛亥革命史和近代社会风俗史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写作了从《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的文章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著作，在近代社会风俗史的研究中取得些许成就，是与两位先生这段文章的启发分不开的。他们不仅指出了研究社会风俗的重要意义，而且在研究的思路、基本观点等方面都给了我深刻的启迪。

一篇论述辛亥革命时期暗杀活动的文章,既使我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又使我得以在国际学术殿堂里忝列末座,并最终帮助我开辟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所以我常常对人开玩笑地说“我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听者惊诧之际,我便从容地道出以上这段机缘,使听者从惊诧的神情终于转为会心的微笑了。

三、两张合影的比较

10年后,即1991年,在武昌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既以社会风俗为研究对象,对服饰便特别敏感。我保存着1981年会议和这次会议的两张合影,拿出来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1981年时,中国大陆的官员和学者除了少数几位年轻人穿着青年装,个别人穿着未打领带的西服外,几乎是青一色的中山装,显得庄严凝重,甚至连蓄有大胡子的美国学者高慕柯(加斯特)也不例外,以此表示他对中国的友好之情。10年后的照片不同了,中国大陆的官员和学者大部分穿上了笔挺的西服或潇洒的夹克,颜色也多样化,不再是10年前青的或蓝的一统天下了。服饰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和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也象征着环境的宽松,学术的活跃。

事实也是如此。70周年的会议,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陆学者与外宾是分开地点住宿和就餐的;而在80周年的会议上,中外学者被安排在同一幢楼房里住宿,在同一个餐厅里就餐,增加了彼此的接触和相互的了解与交流。70周年的会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台湾学者出席;而80周年的会议上,人们听到了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很有成就的学者的声音。在大小会上,讨论气氛相当热烈,有提问,有争论,持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外的交谈也很活跃,形成了一种自由讨论问题的学术氛围。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韩国学者,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事情。在华中师大举行的会议开幕式上,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华中师大负责人戴绪恭先生

以东道主身份在会上致欢迎辞。在我代为草拟的这份讲稿中,有关于“南朝鲜”等外国学者与会的内容。当我听到前面讲话的会议主持人说的是“韩国”时,我立即写了张字条传递到主席台上,请戴先生将讲话稿中的“南朝鲜”改念为“韩国”,以便与前面的讲话保持一致。这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改动,却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森时彦在回国后所发表的关于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报道中写道:在开幕式上出现了致辞时将原稿中关于“南朝鲜”的表述迅速改为“韩国”的一幕,这反映了中韩两国正在急速接近而人们的认识还跟不上的情形。日本朋友的观察和推测是正确的,当时中韩两国正在密切接触,不久以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韩国”国名代替“南朝鲜”称谓,频繁地出现在我国的新闻传媒中。

在武昌开会,湖北武汉地区不能没有数量多、质量好的论文提交大会,否则只能起到在会上为人“端茶倒水”的作用。因此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都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湖北武汉地区史学工作者为大会的召开作充分的学术准备。筹备活动从 1990 年就开始了,各有关单位编撰、出版了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资料集、工具书,其中不乏力作和精品,如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昌起义纪念馆集体编绘的《辛亥革命史地图集》等。许多学者撰写了具有新意的辛亥革命史论文。1991 年 4 月,省社科联在蒲圻召开了湖北省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预演的会议、检阅的会议、鼓劲的会议。会上社联领导“恩威并施”,既作出了对入选国际会议的论文作者给以奖励的承诺,又立下了完成不好任务就“打屁股”的“军令状”。其实,学者们并不为奖金所动,也不为“打屁股”所惧,他们本着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默默地辛勤耕耘,并把自己最好的成果奉献出来。果然不负所望,湖北入选论文竟有 16 篇之多,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再次名列前茅。当然,省社科联领导说话算话,对于为湖北争了光的论文作者们颁发了奖金。

在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 10 年前出席武昌会议的李喜所、宝成关、饶怀民等当年被称为“年轻的后起之秀”的几位朋友,还有八九

位是 1981 年长沙青年会议的与会者,他们自称“长沙帮”。老友相聚,分外喜悦。这批人现在有的年届“不惑”,有的已近“天命”,都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骨干。更令人高兴的是,这次会上还见到了不少更年轻的新面孔。在这些中青年学人身上,人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美好前景。

附记:这篇代用的《引言》原题《学术盛会漫忆》,原刊于《湖北文史资料》1996 年第一辑,这次仅有少量删节。我之所以要用这篇文章作为本论文集的《引言》,乃是因为它和本论文集的二十几篇论文一起,记录了我三四十年来问学与治学道路上的一个个足迹。这次结集出版的文章,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问题,但都是自己治学的心得体会,集中印出,一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二是希望得到学界再次检验批评的机会。

本论文集基本由两组文章构成,一组是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一组是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合在一起,既集中地反映了本人在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上的见解,又揭示了辛亥革命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因此定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这些文章发表于不同年代、不同出版物上,因此注释很不统一,而且早期文章的注释还不够规范,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这次没有做统一注释的工作,敬希读者鉴谅。

目 录

引言	(1)
20 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	(1)
世纪的觉醒	
——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 20 世纪的认知	(16)
“国民”之发现——1903 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36)
1903 年“沈荇案”及其影响	(49)
1905 年的五大臣出洋	(63)
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	(77)
试论民国初年部院之争	(100)
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	(117)
梦想,还是理想?	
——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	
《实业计划》的可行性	(131)
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	(149)
辛勤的耕耘,丰硕的收获	
——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171)
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	(190)

维新运动与移风易俗·····	(200)
义和团运动与民间风俗·····	(212)
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225)
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	(241)
社会转型与风尚演变	
——民国社会风俗变革的若干特点·····	(259)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 ·····	(273)
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	(289)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商事习惯变迁·····	(313)
近代东南社会“贱民”群体的复权意识与复权斗争 ·····	(328)
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	(338)
从弱势群体特征看民国时期人力车夫救济制度·····	(359)
《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前言 ·····	(384)

20 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

世纪之末,人们纷纷对本世纪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作为历史研究者,借此机会对百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作点小结,也是很有必要的。辛亥革命史在学科分类上只能是一个小小的三级学科,而从革命进行的当年到今天,从国内到海外,曾经从事和正在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人何其多,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凭笔者有限的学识、见闻,凭这万字左右的文章,实在难以全面地勾稽铺陈,一一论列。取巧之法,乃就管见所及,仅对中国大陆 20 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作一鸟瞰式回顾,即使如此,也还不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恳请识者鉴谅。

辛亥革命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巨大变革之一,也是 20 世纪世界上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深远影响在事变当时就已被具有眼光的人们所认识。因此,关于这场革命的著述几乎在革命准备时期就开始出现了。1896 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这是一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研究,随后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了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了日本,在那里从

事革命活动。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于 1902 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著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1911 年出版的《大革命写真图》（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中国革命史》（苏生著）和 1912 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记事本末》（郭孝成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则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早期记录。如果说前几种多是报章资料 and 文件汇编的话，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著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均可视为那个时候的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氏还提出了写作信史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①，至今对于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久，人们可以从容地编纂历史，出现了有一定编著体例的著作。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容共分六篇：匡复、军政、财政、民政、司法、自叙，初备专志规模；而谷钟秀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以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起点，其创榛劈莽之功不可没。

后来，有更多的辛亥革命参加者撰写回忆录式的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记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资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 页。

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记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30 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人物传记,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月旦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以不符事实为由遭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士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著了《中国国民党史稿》,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著述,以收集到的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 220 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有较详细记述。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著了关于孙中山传记

的两部著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时代》，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这些著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文字，其篇幅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邓慕韩、谭彼岸、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些科学论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方针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54 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了一条线索。这类著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方面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 1949 年以前关于辛